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浙江大学人文学术丛书

何忠礼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浙江大学人文学术丛书

何忠礼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 何忠礼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7

(浙江大学人文学术丛书)

ISBN 7—5325—3717—X

I. 中... II. 何... III.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IV. K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2732 号

浙江大学人文学术丛书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何忠礼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总发行所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625 插页 5 字数 430,000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325 — 3717 — X

K · 581 定价:4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T:64063949

《浙江大学人文学术丛书》编辑例言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前身,是创办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和育英书院的相关学科。求是书院1928年发展为浙江大学,设文理等学院,1939年文、理学院分设;育英书院1914年发展为之江大学,1940年设文学院。1952年我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浙江大学成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它的师范学院、文学院和理学院的一部分与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合并组建为浙江师范学院,它的农学院和医学院分别发展为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为杭州大学。1992年杭州大学成立人文学院。1987年浙江大学复设中文系等人文学科,1995年成立人文学院。1998年9月15日,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1999年7月,由原杭州大学人文学院、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大部分及原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人文学科有关单位合并组建的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正式成立。

两浙自古人文荟萃,浙江大学地处杭州西子湖畔,环

境优美,是读书治学的好地方。近百年来,劳乃宣、邵裴子、宋恕、张相、马叙伦、陈去病、沈尹默、何燮侯、蒋方震、许寿裳、邵飘萍、邵元冲、梅光迪、钱穆、张其昀、贺昌群、张荫麟、钱基博、汤用彤、郁达夫、马一浮、丰子恺、谭其骧、林汉达、夏承焘、朱生豪、金仲华、王遽常、王驾吾、胡士莹、姜亮夫、任铭善、王季思、严群、陈乐素、沈炼之、蒋礼鸿、郭在贻等人文学科的著名学者先后在这里学习和任教,他们培养了大批人文学科的优秀人才,撰写了许多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研究论著,奠定了浙江大学人文学科博雅求是、开拓创新的优良学术传统。

新浙江大学及其人文学院的成立,适逢新世纪和新千年到来的时刻,它为浙江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契机,也成为浙江大学人文学科发展新的起点。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科学更重视积累,这是由人文科学研究对象的特点决定的。自然科学反映的是人类对自然界现象和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社会科学探讨的是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人文科学关注的是人的本质、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其精神世界。当然,这种划分是相对的。各门科学的研究领域有相互交叉的地方,但它们的分野基本上是清楚的。在这几个领域中,人的本质、生存状态,特别是其精神世界的变化最缓慢,也最微妙复杂。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日新月异不断变换相比,人文科学关注的始终是人类具有思想能力以来一直思考的那些问题,只不过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与世推移有所变

化而已。当代人对自然界现象和规律的认识已远非早期的人类所可比拟,但我们很难说当代学者对人的本质、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其精神世界的洞察已超越古代圣贤。如果把自然科学比作一列向无穷深邃的时间和空间隧道高速飞驰的火车,那么人文科学则有如一群人围绕着旋转舞蹈的一座亘古不息的火堆。不同时代的人文科学研究者,只是根据他所直接面对的现实和自身的独特感受,从不同的方位和角度,给这座火堆投去一根枯枝,抑或一片干叶,以使它永不熄灭而已。每个富有自省精神和责任感的人文科学研究者,都不免为自身智慧的有限感到惭愧,同时又为自己向这座火堆投献了它熊熊不熄所必需的一枝一叶而感到自豪。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浙江大学人文学术丛书》的目的,就是为浙江大学人文学科以至整个人文科学的发展,作一点细微然而坚实的积累工作。入选的著作篇幅长短不拘,唯求实事求是,言之有物,尊重前人研究成果,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有所创新,符合学术规范。该丛书约请国内外同行专家进行匿名评审,每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五种种左右,近期书稿主要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史四个列入“211工程”建设的学科中遴选,条件成熟时遴选范围将适度扩大。由方一新、卢向前、包伟民、沈松勤、张涌泉、廖可斌(按姓氏笔画为序)组成《浙江大学人文学术丛书》编辑小组,张涌泉、廖可斌为召集人,负责丛书的编审事宜。该

丛书出版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及张晓敏等先生的支持,谨致谢忱。

《浙江大学人文学术丛书》编辑小组

2001年3月1日

绪 论

(一)

1981年10月,笔者从原杭州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系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不久,我的导师——宋史研究室主任徐规教授要我给本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一门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课程,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门课程很重要,它不仅能帮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史的基本史料,掌握寻找史料、鉴别史料的本领,而且还可以向他们介绍一些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基本方法,可惜现在已长期没有人讲授了,希望你能将它开设起来。”当时,笔者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刚刚起步,有关史料学的知识更是肤浅,鉴别和利用史料的基本功也不够扎实,觉得要胜任这门课程的教学任务,恐怕有负重托,心里颇为踌躇不安,但在先生的一再鼓励之下,还是硬着头皮接受了下来。

我所以勉力承担起讲授中国古代史史料学这门难度不小的课程,师长的嘱托固然是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从自己指导研究生撰写论文的切身体会中,确实也深深地认识到这门课程的重要性。笔者经常看到,周围许多学生面对浩如烟海的史籍,不知怎样才能找到自己所需的史料,他们不太了解各种史料的性质和类别,甚至

不会使用像《四库全书总目》、《中国丛书综录》这类检索书目的大型工具书,于是不免发出“论文好写,史料难找”的慨叹。有人花费了大量精力,终于找到一大堆与课题相关的史料,可是因为内容形形色色,甚至相互抵牾,竟不知道怎样去鉴别和取舍才好。有人因为对史料领会不深、消化不透,又不熟悉一般的引用方法,在论文中要么大段大段地照抄,要么生搬硬套地截取,缺乏与自己所持观点的有机联系和与文章的融会贯通,总给人以隔靴搔痒和辞不达意的感觉。如此种种,都给刚刚开始步入史学殿堂的研究生带来困惑。

事实证明,只有较好地掌握史科学知识的人,才能在浩如烟海的史籍海洋中比较容易地找到自己所需的史料,才能出色地驾驭史料,不致迷失方向,取得事半功倍的功效,这对于论著的撰写,特别是对于培养史学研究和古籍整理的人才来说,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笔者不揣识昧,一方面吸取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自己做学问的体会,另一方面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古代典籍非常繁杂的特点,在讲授史科学这门课程时,努力做到因材施教,删繁就简,突出重点,注重系统性和实用性,尤其在如何鉴别史料和运用史料方面颇费了一番功夫。这样边研究边教学,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和探索,终于撰写出了一部自认为稍有特色,较为系统,具有一定针对性和实用意义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初稿。近几年来,笔者在听取部分学生和教师意见的基础上,又对初稿作了修改和补充,今天终于定稿付梓,将它奉献于广大读者的面前。本书的出版,如能对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年轻学子特别是研究生们有所帮助,幸莫大焉。

(二)

众所周知,研究历史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正确的理论,一是足够的史料。理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如果一个人辛辛苦苦地搜集了大量的史料,殚精竭虑地获得一个研究成果,可是由于缺乏正确理论的指导,其基本观点却是错误的,这一研究成果也就毫无学术价值可言。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同样十分重要。它犹如筑成史学大厦的原材料,要建筑大厦,没有设计图纸不行,没有水泥、钢筋、木料、砖块也不行;要研究历史、撰述论著,光有理论观点而没有史料,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研究的道路上将会寸步难行。过去,人们曾围绕“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两种不同的观点争论不休,实际上这两者的是非是明摆着的:既然理论来源于实践,“论从史出”当然是不争的事实。

历史上,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从未有人表示怀疑。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对他的弟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八佾篇》)意思是说,孔子能讲夏礼和商礼(这是经过口耳相传得到的知识),可惜夏、商的后代没有将文献资料留下来,否则的话,可以将它们拿来作为根据。直至近代,有些著名学者甚至提出了“史学本是史料学”(蔡元培:《明清史料·序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出版)的口号。傅斯年先生进而认为:“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家的责任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史学方法导论》,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二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出版)他们对史料的这种推崇,尽管也受到另一些学者的批评,但批评者

并无半点轻视史料的意思,如批评者之一的周谷城先生说:“史料是历史的片断,从片断的史料中可以发见完整的历史;但完整的历史之自身,决非即等于片断的史料。”他又说:“‘史学本是史料学’这话对于史学界有益,但不正确。治史的人往往轻视史料,其实离开史料,历史简直无从研究起。历史自身虽不是史料,但只能从史料中寻找而发见出来。”(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第2页,上海开明书店1939年出版)由此可见,言“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话,虽然看起来强调得似乎有点过头,但史料的重要性却是公认的,对那些尽兜理论圈子而不顾史实的海派学者来说,无疑也是一贴清醒剂。人们常说:“搜集好史料,便是完成了史学研究的一半任务。”这话确实一点不假。

史料学研究的对象是史料,那么,什么是史料呢?所谓史料,就是研究历史所需要的各种资料。史料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史料包括了宇宙世界所存在的一切事物,若按性质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实物史料,一类是口传史料,再一类是文字史料。

实物史料是指存在于世界上的一切与人类历史发展有关的实物和遗迹,从一块经过初步加工的石头、一枚古人类的牙齿化石、一个古遗址、一幢古建筑到以往人们所使用过的、制作成的甚至接触过的一切物品、器具,都可以作为实物史料。今天陈列于博物馆中的展品,绝大多数都是实物史料。年代越久远,实物史料就越显得重要。如原始社会的历史,因为没有文字依据,基本上就只能依靠实物史料。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历史还是以生活在四十余万年以前的北京猿人的时代作为开端,进入六十年代,当人们发现了元谋猿人的化石后,我国历史的开端就被推进到了170万年以前。如果今后发现比元谋猿人更早的人类化石,这个时间将再一次被改写。以往史学界一致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但是随着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辽河流域、四川盆地等地新石

器的发现,人们逐渐改变了这个看法,知道中华民族的文明应是多种文化的融合,而不是单向性的传播和扩散。以前,研究农业史的人有一种传统说法,认为小麦原产于西亚,进入文明时代甚至直到张骞通西域以后才传入中国。有人从古代中国北方的自然条件不适合小麦种植,有人以汉字中很多谷物名是以“禾”字为偏旁部首,而“麦”字却是从“来”字派生出来的等理由,来解释小麦是从国外传入的。但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在甘肃民乐东灰山史前遗址收集到5000年前的大麦、小麦、高粱、黍的炭化籽粒,雄辩地证明了我国也是小麦的原产国,使以前的种种猜测不攻自破(参见李璠等《甘肃民乐东灰山新石器遗址古农业遗存新发现》,载《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即使是先秦和先秦以后的历史,实物史料也起着重要的补充和佐证的作用。如秦朝修筑万里长城,这在《史记》中虽有明确记载,但对其形制、质料和构筑方法,特别是它的具体位置,还得通过对长城遗址的实地考察发掘才能得知。再如秦汉时代的度量衡,折合今天应该是多少,人们主要是通过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战国铜尺、西汉建初尺、新莽货布尺、晋前尺、秦始皇二十六年方升、汉量、汉锤、秦权、新莽嘉量等实物中获得了解。以上都足以说明实物史料之重要。

口传史料主要是指传说和民歌。远古人类没有文字,或文字很简单,或很不普及,他们的历史,大多借助于传说和民歌得以保存。《说文解字》对古字的解释是:“从十口,识前言者也。”它形象地告诉人们,历史乃是经过许多人的口传而成的。作为证据之一,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讲到 he 撰写《史记》一书时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汉书·司马迁传》)这里所说的“放失旧闻”,主要是指司马迁从田父野老中所听到的传说,说明《史记》有很大一部分史料来源于口传史料。再以《史记·淮阴侯列传》来说,司马迁如果仅据文献资料,决不

能将韩信此人写得如此栩栩如生,而非得采用大量的口传史料不可。对此,在传后赞语中有“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的话可以作为佐证。口传史料不仅对先秦史关系重大,对以后的历史也有重要意义。今天人们研究蒙古族的兴起和蒙古汗国早期的历史,《蒙古秘史》一书是重要的史料来源,而该书就是在成吉思汗命人创制蒙古文以后,用它追记流传在蒙古大草原上的传说故事和谚语而成的。再如我国著名的三大英雄诗史——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王传》、柯尔克孜的《玛纳斯王传》,都是长期流传在这些民族中的诗歌,它们不仅代表了某一民族在古代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艺术成就,也为研究这一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以《格萨尔王传》为例,就有一百二十多部,一百多万诗行,约两千多万字,它部分地反映了11世纪到19世纪时期藏族的一些历史和生活状况。

文字史料,在三种史料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今人研究古代史,尤其是秦汉以后的历史,基本上要依靠文字史料。所谓狭义的史料,就是指文字史料而言,本书所介绍的史料,基本上也限于文字史料。文字史料又可根据其依附于不同的器物或材料(即载体)而分为若干种。

一种是甲骨文史料。这是依附于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史料。甲骨文最早发现在殷墟(今河南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村),是我国三千多年前商王盘庚迁殷至帝辛(纣王)亡国273年间的遗物,所以人称殷墟甲骨文。又因为甲骨上所刻写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殷王室贵族占卜用的卜辞,所以又称殷墟卜辞。殷墟甲骨文是研究殷商历史的重要史料来源。后来,在殷墟以外的山西、陕西、河北等地都陆续有甲骨文出土,这又为史料较缺的西周史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到目前为止,共发现带字甲骨二十余万片,计四千五百余个单字,但今天能够释读的尚不足一半,其作为史料的局限性是

显而易见的。

一种是金文史料。这是铸刻在金属器物上的文字史料。先秦时期,金文多铸刻于贵族们作为礼器制造的钟和鼎等大型青铜器上,所以又称钟鼎文。虽然金文盛行于西周到战国时期,但从最新的考古发掘来看,尚有比殷墟甲骨文更早的金文存在,因此,金文和甲骨文同属于最古老的文字体系。《墨子·鲁问》说:“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说明金文与甲骨文不同,它是一种有意识的对历史事件所作的记载。金文史料是研究商周至战国历史的重要史料来源,但是简短、零碎,难以释读则是它的缺点。

一种是帛书史料。这是写在薄薄的丝织品也就是缣帛上的文字史料。传说中的黄帝正妻嫫祖已开始养蚕的故事,虽不甚可靠,但我国到夏、商时候已生产缣帛却是事实,故帛书的历史当与甲骨文一样悠久。除了上引墨子所说的话以外,《齐民要术》卷三记越王勾践将范蠡之言“以丹书帛,致之枕中,以为国宝”。说明至少从春秋战国开始,缣帛与竹、木一样,已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并用红色的丹石调水为墨。由于缣帛轻薄柔软,可以舒卷,便于截断和携带,所以直到纸张发明以后,还流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据文献记载,唐代还有人用它来书写、作画的。流传至今的帛书所以非常稀少,主要是因为缣帛比较贵重,只有官僚、贵族才用得起,数量毕竟有限,加上缣帛容易霉烂蛀蚀,不能长期保存,能够传至后世的就更少了。1973年到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大量帛书,其中有《易经》、《老子》、《战国纵横家书》以及关于天文、历法、五行、杂占、医药等方面的内容,另外还有地图2幅,共计28种。上述帛书大多为古代佚书,这是二十世纪帛书史料的一次最为重大的发现,对古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种是简牍史料。这是写在竹简、木牍上的文字史料。简牍

流行于战国至魏晋时期,简用竹片制成,宽约0.5—1厘米,一般长约23厘米,最长的可达七十余厘米。每简书写一行字,也有宽至2厘米左右的简,每简书写二行字,每行一至数十字不等。牍用木片制成,又称札,比简要稍宽一些,有的宽至6厘米,呈板状,长度与普通的竹简相同,每牍字数多的达百字以上。竹简、木牍也统称为简,若干简牍编缀在一起叫做策(册)。最早的竹简,多以漆书写,木牍多用铅画,“故有刀笔铅槩之说”(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七)。大约到春秋、战国时,才开始用墨书写,但为了刨去竹青和误字,仍要用刀。历史上,秦以前的简牍被大规模出土有四次:第一次是在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当时有一个叫不準的人盗河南汲县战国古墓,他爬入死于公元前296年的魏襄王的墓穴,寻找随葬品,见到墓内有大量竹简,就点燃用作照明。不準对竹简并无兴趣,盗后弃之而去,后来官府收点,得数十车,有包括《竹书纪年》在内的书简多部,皆用先秦文字书写,人称“汲冢书”,这恐怕是古代最多的一次竹简出土。第二次是1975年底到1976年初,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睡虎地12座战国末年至秦代的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秦简(详见第一编第一章)。第三次是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荆门纪山镇郭店村一号楚墓发掘出了一大批秦简和战国楚简(详见第一编第一章)。第四次是2002年6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南湘西龙山县里耶镇的三座古井中的一座,发掘出了三万六千余枚秦代竹简和木牍,它被考古学界喻为经兵马俑之后,秦代考古最为重大的发现,目前正在逐渐清理解读之中。里耶秦简是一套日志式实录,已清洗出的秦简年代,从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到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按年、月、日记事,十几年连续不断,从中可以了解秦代的地方建置、邮政、军事、法律、科学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里耶秦简中已有用篆文书写的九九乘法表,以及关于秦代设有洞庭郡的记载。这些新

发现,将改写秦的历史,史料价值可与甲骨文、敦煌文书等媲美。里耶秦简的大部分文字属于秦隶,从小篆演化而来,和睡虎地秦简的字体相类似。

汉代的简牍也很多,迄今已发现4万枚左右,其中主要出于边塞、属于屯戍遗物的有敦煌汉简、居延汉简、罗布泊汉简等,出于汉代墓葬的则有湖南马王堆汉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甘肃武威汉代医简、湖北江陵凤凰山汉简、青海大通县上孙寨汉简等。此外,在河南、河北、安徽、四川等省区也都陆续有汉简发现。由于汉简数量多,内容丰富,所以成为今人研究汉朝历史的重要史料来源。即使在造纸术发明以后,简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仍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1996年7月至12月,湖南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配合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市中心走马楼街西侧街区的五十余口古井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其中一口井里出土了一大批三国孙吴纪年简牍,包括竹简、木牍、封检和签牌等,共有14万枚,是上个世纪我国继甲骨文和敦煌遗书以后最为重大的文献资料发现。全部简牍经清洗后,保存在长沙市博物馆。出土简牍呈灰棕色或褐黄色,长短宽窄各异,字体工整有序,隶中带楷。每片字数多少不等。木牍每枚有80至120字,竹简每枚有30至40字。内容有东汉末年特别是三国东吴时期的大量地方文书档案,大致包括嘉禾吏民田家煎司法文书、黄簿民籍、名刺、签牌、缴纳各种赋税和出入仓库的簿籍等,这对于研究史料十分缺乏的东吴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简牍的优点是书写材料比较容易获得,缺点是作为书籍十分笨重,保管也不方便。据说秦始皇规定自己一天要看奏章120斤(约合今60斤),他所看的就是简牍,如将那些奏章写在纸上,恐怕也不过几十页的光景。

一种是石刻文字史料。这是镌刻在石板、岩壁上的文字史料。石刻文字史料又有石鼓文、石经、墓碑铭、摩崖石刻和石碑等多种。

从前面所引《墨子·鲁问》的记载来看,石刻文字出现的历史与金文、简牍、帛书一样久远,但由于石头容易风化,所以先秦时期遗留下来的石刻文字很少。据目前所知,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是用秦国的大篆即籀文刻在 10 面石鼓上的文字,所以人称石鼓文。每面石鼓上刻有一首四言诗,共 10 首,内容为歌颂秦国国君的游猎活动。这些秦石鼓后来经过辗转搬迁,损毁已十分严重,今天被陈列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古代,人们为了普及儒家经典,或为了统一儒家经典的内容,平息因师承不同而引起的争议,将经文镌刻在大的石碑上,作为定本,人称石经。我国古代的石经,以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和开成石经最为有名。熹平石经是熹平四年(175 年)汉灵帝命文学家蔡邕等人用隶书一体写成后,镌刻于 46 块石碑上,故称一体石经。这个石经原立于洛阳太学的前面,有《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等七经,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正始石经镌刻于曹魏明帝正始年间(240 年~248 年),由嵇康等人将《周易》、《尚书》、《毛诗》、《春秋》等儒家经典的部分内容,以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镌刻在 35 块石碑上,故称三体石经。可惜由于石碑的自然风化,加上拓印者的人为破坏,以上两碑皆早已不存。唐文宗大和七年(833 年),郑覃等人奉命用楷书将《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十二经的内容刻成石碑,另附有《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等,共 227 块石碑。字体为正书,标题为隶书。历时 4 年,至开成二年(837 年)完成,人称开成石经。一千余年来,经过后人多次修改、补刻和添注,今天仍然较好地被保存在西安碑林。

墓碑铭是指墓碑、神道碑和墓志铭。墓碑竖于坟墓前面,上面镌刻的文字不多,一般只有墓主的姓名、安葬时间和子孙或亲族的名字。神道碑是竖立于墓前神道上的石碑,它比较高,上面镌刻